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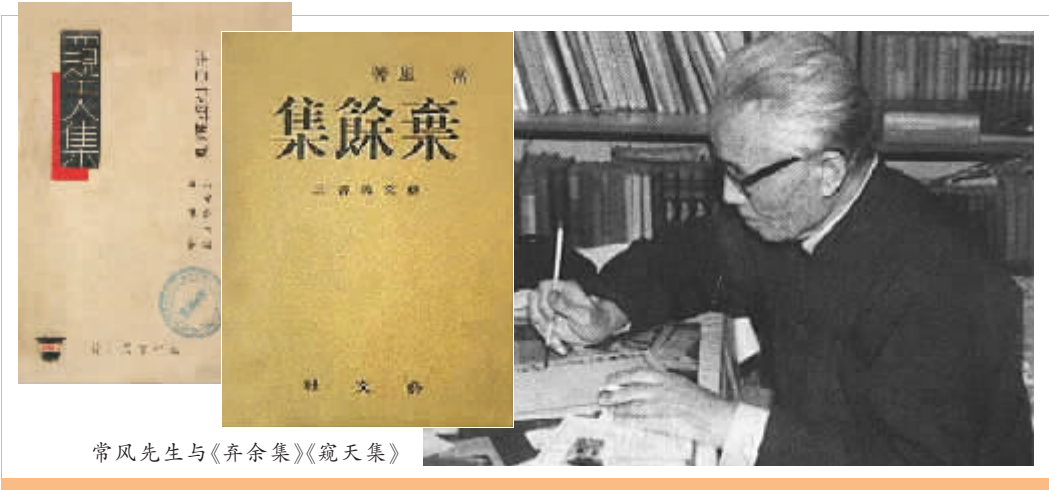
一度被遗忘的书评家常风

■郭晓斌

常风先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重要书评家。近年来，常风的作品又日渐引起学界注意，但就其成就和贡献而言，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应有的评价。与常风同时代的诸如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等人在文学批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为世人知晓并赢得盛名，但常风似乎一度被遗忘了。客观而言，常风自有其独特风格与成就，同样为促进现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与创作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常风，生于1910年9月26日，原名常凤琢，字镂青，山西榆次人。1929年秋，他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期间结识钱锺书、李健吾等，并受老师叶公超的鼓励和关怀，开始书评写作。1934年9月，经叶公超推荐，他的第一篇新文学书评《论老舍〈离婚〉》发表于天津著名的《大公报·文艺》上，沈从文在按语中赞其“批评态度与见解，皆可注意”。此后，常风陆续写下大量书评，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国闻周报》《武汉日报·现代文艺》等报刊上。

结缘于写作，常风与沈从文、周作人、朱光潜、萧乾等日渐熟悉，过从甚密。朱光潜主编京派重要刊物《文学杂志》时，曾两度邀请常风出任助理编辑。而常风协编《文学杂志》时，也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书评。老舍、张天翼、朱自清、李健吾、巴金、鲁迅、叶圣陶、艾芜、茅盾、萧军、吴组缃等诸多作家的作品，都是常风评论过的对象。常风所写的这些书评以及文艺评论，在1944年、1948年先后结集为《弃余集》和《窥天集》出版。



有学者提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清华学派”，认为“该学派主要成员以叶公超为中心，包括清华外文系学生钱锺书、李健吾、常风、郑朝宗和外系学生李长之等”。诚如斯言，无论是常风，还是他的好友钱锺书、李健吾等，他们后来的文学批评活动，确与清华外文系的背景及恩师叶公超有着密切关系。清华时期的叶公超曾主编后期《新月》《学文》，并极力引导学生进行创作、翻译及批评研究，帮助他们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这两份刊物在叶公超主编期间，“刊物中文学批评的比重越来越大，评论的氛围越来越浓厚”，显然不是偶然的。正是在叶公超的鼓励 and 指导下，常风勤于动笔，在《新月》和《学文》上发表了散文及两篇外国文学书评；又经叶

公超推荐，在《大公报·文艺》发表新文学书评，从而走上了写作书评的道路。

常风后来结识的沈从文、萧乾、朱光潜等京派作家，都非常重视书评写作。在他们主编的《大公报·文艺》的“栏目介绍”和《文学杂志》的“编后记”里，即能明显看到对于书评写作的突出强调与欢迎。由于他们热情约稿，常风笔耕不辍，所写书评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起到了针砭时弊、启迪读者的作用”，成为当时著名的京派书评家之一。以《大公报·文艺》为例，据陈子善统计，发表书评最多的作者并非最著名的京派批评家李健吾，以数量排序，依次是李影心（十七篇）、常风（十六篇），以“刘西渭”之名写作书评的李健吾（十四

篇）只能屈居第三。所以陈子善说：“李影心和常风、刘西渭是《大公报·文艺》书评的三大‘台柱’。”而《文学杂志》也是几乎每期刊发常风的书评，有时甚至在一期中刊发两篇（如1937年第一卷第四期）。如此频繁地发表一系列高质量的书评，可见常风当时作为书评家的活跃状态与广泛影响。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就读于北大中文系、同样写作书评的吴小如，当时就自认是常风的私淑弟子，经常到任教西语系的常风住所拜访请教，相谈甚欢。

1952年，随着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常风由北京大学转至山西大学任教，服务乡梓，也不再从事评论与写作。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常风渐被人所淡忘。但在香港，司马长风在上

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多处引用常风书评的观点，并对作为京派成员的常风给予较高评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重写文学史”与学界对京派作家的重新重视，常风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姜德明、陈子善、谢泳、韩石山等都拜访过常风或与之有过书信往来，也写过文章予以高度评价，使得常风及他在书评方面的成就渐为人知。李辉1989年编选《书评面面观》时，收入的常风书评与李健吾一样多。199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将《弃余集》的全部书评，连同常风在新时期所撰回忆师友的纪念文章结集为《逝水集》出版。1998年，陈子善为常风重新编选的《窥天集》增补本出版，搜集集外文和佚文近三十篇，吴小如作序，陈子善写《编后记》。同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常风的评论选集《彷徨中的冷静》。

2002年4月11日，常风先生以九十二岁高龄在太原病逝。2010年，正值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由谢泳发起，《名作欣赏》杂志社与太原万象书城联合举办“纪念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

陈子善说：“我认为像常风先生这样优秀的书评家、文学批评家，长期不为人知，实在是不公正的，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严重缺陷。”诚如斯言，常风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工作，足以今天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这或许正是一生默默治学、无心功名的常风先生所由衷期许的。

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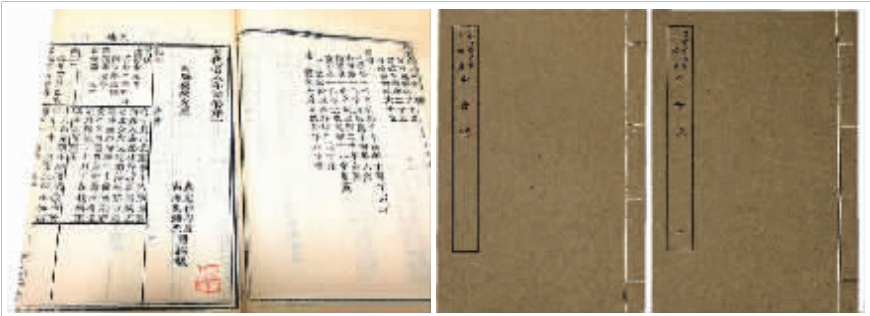
清代学者吴荣光（1773~1843）的《历代名人年谱》，是出现得较早的综合年谱，读者可通过此书了解所收名人的生平大事和有关背景。鲁迅在1930年为老朋友许寿裳（1883~1948）之子许世瑛（1910~1972）开列的书单中列入此书，并指出，读此书“可知名人一生中的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这是告诉许世瑛怎样快速地查到历代名人活动的历史背景。

鲁迅后来又说：“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事，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且介亭杂文·序言》）时至今日，年谱越出越多，编得越来越好，再加上又出版了很多编年体的文学史和中外历史年表，所以古老的吴氏《历代名人年谱》已被淘汰，三省堂版《年表》也过时了，但鲁迅关心文学之社会背景的指示仍然是必须注意的。

吴荣光是广东南海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湖南巡抚，也是著名的藏书家和学者，所著《历代名人年谱》在其身后有咸丰二年（1852）万忍堂刊本，一部十册；今有上海书店1989年排印本。

鲁迅推荐的两种书

■顾农



《历代名人年谱》与《今世说》

鲁迅藏有此书的原刊本。《鲁迅日记》1926年10月14日载：“晨收（宋）紫佩所寄《历代名人年谱》一部十本，二元五角。”此时鲁迅在厦门大学国学院教书，需参考此书。后来他又推荐给老友之子，作为学习古代文史的参考之用。吴荣光编撰的《筠清馆法帖》，鲁迅亦曾购藏其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详见《鲁迅日记》1932年8月11日及年末书账）。

王晔《今世说》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在讲过《世说新语》之后，继续就其影响写道：……《世说》一流，仿者尤众。刘孝标有《续世说》十卷，见《唐志》，然据《隋志》，

则殆即所注临川书。唐有王方庆《续世说新书》（见《新唐志》杂家，今佚），宋有王说《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明有何良俊《何氏语林》，李绍文《明世说新语》，焦竑《类林》及《玉堂丛话》，张塘《廿一史识余》，郑仲夔《清言》等；然纂旧闻别无颖异，述时事则伤于矫揉，而世人犹复为之不已，至于清，又有梁雄枢作《玉剑尊闻》，吴肃公作《明语林》，章抚功作《汉世说》，李清作《女世说》，颜从乔作《僧世说》，王晔作《今世说》，汪琬作《说铃》而惠栋为之补注，今亦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说》也。

在这一批模仿后续之作中，清初人王晔（字丹麓，1636~？）《今世说》是比较优秀的一种，该书严允肇的序言说：“自清兴以来名臣硕辅，下逮岩穴之士，章句之儒，凡

一言一行之可纪述者，靡不旁搜广辑，因文析类，以成一家言。其大要采诸序记杂文之行世者，而不敢妄缀一词，其详慎不惮烦如是。”

鲁迅曾为许寿裳之子许世瑛开列此书，并指导他注意其中所记之“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按此书虽强调只记“自清兴以来”的人物言行，但正如该书例言之一所说，“间有文章事业显于胜国（指明朝）而卒于本朝者，要不可不谓之今人也，亦为采入。”此书涉及明清之际的大小名士约四百人。

《今世说》的门类一依《世说新语》，但减少了六门（自新、黜免、俭嗇、谗险、纰漏、仇隙），只有三十门。这无非是不愿意得罪任何当代名人的意思。王晔行文简隽，可读性很不错，试略举两条来看：

王阮亭于役淮阴，泊舟秦邮湖，风雪凝冽，凄然动心，秉烛作《岁暮怀人》诗六十首。夜漏未半，属草就。词旨清丽，间出奇峭语。茶村杜处士语人曰：“使君才藻如许，当是天人。”（《文学》）

杨香山客扬州，有鬻鹤者，倾囊为易二双载归。嘲笑并至，杨曰：“予门可罗雀，对之如得良友；老乏丁男，抚之如倚玉树。寂处无丝竹之娱，屡空有交谪之感，戛然一鸣，悦心盈耳，忧郁可捐。”因赋诗十章，为友诵之。（《慈溺》）

《今世说》初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咸丰二年（1852）被收入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遂流布甚广。此书今有陈大康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与《竹叶亭杂记》合订为一册，列为《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之一），取读最便。